

匡亚明 主编

易惠莉 著

郑观应评传 (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观应评传/易惠莉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6023-6

I. 郑… II. 易… III. 郑观应(1842~1921)-评传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6195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郑观应评传

易惠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48.25 字数 520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023-6

定价:95.00 元(上、中、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王 湛 陈万年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巩本栋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第十六章 《盛世危言》(十四)

一、上海绅商与强学会

1895 年是中国政坛酝酿发生重大变化与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关键的一年。这年的 5 月间康有为在京发起“公车上书”，揭开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此后他又与当政的清流派政治力量相结合，创立推动变法的政治组织——强学会，由此变法论朝政治合法化方向上迈出坚实的一步，康有为、梁启超作为新一代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开始登上中国政治的大舞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上海作为维新思潮的策源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寓华西人团体广学会 1895 年 10 月发布的第八届年报，为我们了解上海绅商在其中的作用、地位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所谓：

(上海的)中国商人中的一些经理们除了成倍订阅我们的书刊外,还买了我们的一些出版物分赠给在京城的一些高级官员。有一位住在上海的翰林特别喜欢看我们的《万国公报》,他经常给在京城翰林同僚们寄多达三十多份的《万国公报》。^①

还有一条是直接讲述郑观应的,即:

上海的中国商会会长带了我的许多出版物,特别是《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分送给在北京城的一些重要官员。在他自己写的一本书里(已在北京城发行)特别提了林乐知博士和李提摩太先生。^②

① 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办:《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第88页。下文引用本刊不再注明编者。这里所言翰林,指龚心铭,系时驻英公使龚照璠之子,孙家鼐侄婿。龚心铭后与蔡尔康为广学会第一批华人会董。龚心铭与广学会西人,尤其是与林乐知关系密切。(龚心铭:《上叔岳孙家鼐燮臣大司空书》,《万国公报》1896年8月。《万国公报》,第16231~16233页)

② 《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第89页。这里广学会将郑观应称为“中国商会会长”,不知出于何因。该资料强调了总理衙门该年刊印《盛世危言》(五)一事,注意到郑观应对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的肯定。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五)《传教》篇中称:“近有久于中国者,不忍坐视其困,多将中外利病著书救世,如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等辈是也。”(《郑观应集》(上),第407页)甲午战争之后,郑观应与广学会中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交往较多,并在其著述中常提及这些传教士的著作。另外,1894年英国民间禁烟协会会长亚历山大来华,在广学会董事李提摩太、慕维廉陪同下,拜访了郑观应。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十四)《禁烟上》中称:“英国禁烟会董事亚历山打,自伦敦来游印度、中国,查探洋烟是否有害华人,曾偕广学会董李提摩太、仁济医院总理慕维廉,到招商局与余一谈,问有无良策。余即将所拟禁烟论告之。”(《郑观应集》(上),第396页)后来郑观应又在《致英国博士李提摩太书》(《郑观应集》(下),第317(转下页))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寓华西人高度评价上海绅商社会对维新思潮兴起的积极作用。康有为显然也意识到上海的这种特殊地位,以及上海绅商社会对维新变法运动的极大热情,他未待北京强学会成立就于10月中出京南下,要强学会“总会立于上海,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①。视上海为维新运动的枢纽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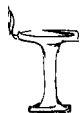
上海绅商社会不但有推动维新变法的积极性,而且他们在政治新动向的敏感性上亦毫不比北京的士大夫们逊色。甲午年间经元善、谢家福、沈善登等人在为“募义饷、兴义兵”事积极交换意见之时,康、梁及《新学伪经考》就已成为他们的中心议题。当康、梁刚开始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上海绅商们所作反应是甲午战后维新活动中值得重视的现象。^②沈善登当时对康有为有极好的评价,称:

康先生闻名已久,前读伪经考颇有卓见,意必其

(接上页)页)中提及此事。在亚历山大在沪期间,郑观应还作诗《赠禁烟会董亚历山打》。(《郑观应集》(下),第1349页)亚历山大来沪是在1894年中,沈毓桂在刊于1894年6月《万国公报》上的《戒烟论小引》中称:“英员亚历山大君奉命来华筹议禁烟良策,鄙人幸获把晤。”(《万国公报》,第14457页)

①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版,第173页。另,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称:“欲推广京师之会,择合群之地而益宏厥规,则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乃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焉。”(同前书,第172页)

② 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关注可追溯到1892年6月15日《申报》载《读长兴学记书后》。该文作者由经元善推荐而读康有为《长兴学记》,文中称:“康先生学记,其所以裨益于后世之学者,……经君既心仪之,曷不为之翻印以惠学人,闻此书无他本,则翻印尤不可缓也。”



人高不可攀,今夏会邂逅晤面,始知仁心仁术,真积学有道君子,佩服之至。惟长兴学记一卷或系年轻时手笔,将来必然后悔。^①

在沈善登的支持下,经元善积极谋求聘请梁启超掌教经正书院,所谓:“今蒙梁孝廉肯莅止掌教,同人闻之感激靡涯,……倘梁孝廉来主讲书院,肯期以岁月,或可望有志竟成也。”^②而谢家福对康有为则有相反的看法:

……亦读过伪经考学记,未尝不深佩其博学强毅,并世杰出人才,必非池中之物。然默窥中藏自是不虚,此君养到未深,而得时太早,恐难免步荆公后尘。苟先遇盘根错节,动心忍性,则家国之幸,亦正是造物之玉成,他日所就未可限量也。^③

谢家福笔下甚至出现“吴越士夫,目康狂生”^④之语。可见康、梁登上政治舞台,从一开始就被上海绅商们关注。康有为也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于1895年11月中到上海。

康有为来沪前得到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的全力支持,张之洞除派重要幕僚梁鼎芬陪同外,并传话江南绅商社会中

① 《经元善集》,第153页。

② 《经元善集》,第154页。

③ 《经元善集》,第155页。

④ 《经元善集》,第151页。



的有影响人物如经元善等配合康有为的活动。^① 曾经管理上海强学会财务的康有为堂兄康有仪,戊戌年后称康有为:“在沪渎日与商人、无赖花酒往来。”^②此说虽有攻击之嫌,但也透露出康有为与上海绅商密切往来的事实。

当时郑观应虽未像经元善那样受张之洞看重而被纳为上海强学会董事,^③但他作为康有为的同乡以及在著述方面的影响,他自然与康有为有更密切的联系。1896年中《盛世危言》(五)一书被列入梁启超编制的《西学书目表》附卷,郑观应得见后谓:《西学书目表》“此书康长素先生在沪阅拙著时,已有此意,不期得自其高弟(梁启超),钦羨无已”^④。这是1895年上海强学会活动期间康有为关于《盛世危言》(五)态度的记录。1895年12月1日郑观应致王韬函则反映了康有为与郑

① 经元善:1896年2月《复康南海主政书》称:“去冬忽承南皮先生作介,幸接光仪,良用欣慕。”1900年11月7日《答原口闻一君问》称:“迨乙未岁制府(张之洞)署两江,助康主事兴强学会,电委仆为董事,揆诸情义,不容再辞。”1900年4月24日《挽救中国本原迂言》称:“逋臣二子,乙未之秋在沪上开设强学会,适南皮张制军署两江,捐助千五百金,电飭元善为董事,始与之接迹。”(《经元善集》,第166、349、315页)

② 康有仪: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书公(梁鼎芬)先生函》。转引自孔祥吉:《关于康有为变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史料》,李时岳、方志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研究论文集》,广东康梁研究会印,第338页。

③ 经元善与张之洞的关系可追溯到1890年夏。经元善自称:“庚寅夏,两湖制府南皮张公,电召赴鄂,欲委仆织布局提调,因意旨未能吻合,恐蹈北洋前辙,不敢奉檄,但竭愚虑上条陈而退。”(《答原口闻一君问》,《经元善集》,第349页)

④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7年版,第298页。下文引用本书不再注明作者及版本。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61年版,第454页。



观应之间另一方面的活动,该函有如下内容:

康长素主政奉南皮命到沪,设立强学总局,约弟午后两点钟同谒先生,邀往格致书院一游,冗次匆匆乎?

该函同时述及:“昨晚已将南皮序送听伯先生察报,不悉已阅否?”^①由该函不但看到康有为在沪的部分活动是郑观应经手安排并陪同进行的,甚至《上海强学会序》载于《申报》这样重要事务也是由郑观应负责联系的。^②

关于郑观应在此期上海强学会的活动中涉入的深度,在强学会被封后郑观应就善后事务致汪康年的函件内容中有充分的显示,该函全文如下:

穰翁仁兄大人阁下:顷奉手示,敬悉一切。强学局之屋,乃怡和洋行唐杰臣兄经手,当嘱与屋主商之径复。尊处所存家具,弟无处可置,请商经莲翁可也。弟前点交强学局之书,缺还《钦定全唐》三本、《渊鉴类函》一本、《钦定唐书》一本、《毛诗稽古》一本,乞飭查回勿失,是为至禱。专此即复,敬请撰安不具。愚弟郑官应顿首。即。^③

① 此函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版,第722页。下文引用本书不再注明作者及版本。

② 张之洞:《上海强学会序》刊于《申报》1895年12月4日,时钱昕伯(王韬之婿)为《申报》主笔。

③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977页。



该函所述情况表明:参与并资助强学会活动的重要绅商人物除了有郑观应、经元善等人外,还有当时怡和洋行的买办唐杰臣。郑观应除了在上海强学会活动中有如此深入的涉足,他在北京方面的联系也并不逊色,维新人士中就有北京强学会“诸人于沪上交涉为郑陶斋”^①一说。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经元善因病以及与康有为“见解稍异”,“旋即稟退”强学会董事职时,他一面告知康有为“宜速招汪穰卿来沪夹辅”,“一面据实稟辞南皮,……准待鹤诸君劬襄,不致功败垂成”。^②

上海绅商社会对康有为及强学会寄予厚望,并积极参与活动,但情况却不能令他们满意。当强学会成立不足两个月遭政府封禁后,郑观应曾向北京强学会重要人物文廷式、陈炽表达了不满意的情绪,谓:

沪上强学会,南省士大夫多列名捐款相助。惜办事者未允选举沪上殷商为董事,所举者多政界中人,故《强学报》未能畅销也。昨江督闻京都书局被封,即嘱强学会停办矣。京都书局因何被封尚未详悉,然弟不禁窃有感矣。^③

郑观应的言论或许带有自己被冷落的情绪,但是从蔡尔康在《万国公报》1895年12月上刊载《上海强学会序》时所写按语来看,上海强学会的确是士大夫们的一统天下。这里有必要

① 转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709页。

② 1896年2月《复南海康主政书》,《经元善集》,第166页。

③ 《致京都文学士道希陈部郎次亮书》,《郑观应集》(下),第369页。



说明的是,《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就上海强学会的活动情况有如此评述:“以人事组织言,张之洞系占绝对优势;以具体办事言,(康)有为门人尸《强学报》笔政。”^①因此上述郑观应就上海强学会组织问题的不满,有可能主要是针对张之洞系的士大夫们。

不过,上海绅商们同样也存在着对康有为的不满情绪。强学会遭封禁前,经元善就已与康有为有“见仁见智,志道不同”之感,他托病辞去强学会董事职时曾向康有为作了如下坦陈:

今闻为言路所劾,此虽关乎气数,然细思之,亦由吾公未能应天以实,感召麻祥所致。弟初读长兴学记,及伪经考诸书,深佩足下之学。去冬忽承南皮先生作介,幸接光仪,良用欣慕。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②

曾对康、梁抱有极大好感的经元善,在与康有为有过一番实际交往后发表上述看法,这在上海绅商社会中具有代表性。其实郑观应上述对强学会士大夫排斥商人做法的批评,应该说也包含着针对康有为。上海绅商社会对变革事业曾投诸极高热情,但在维新运动初兴之际,有变革愿望的士大夫,包括康、梁,却仅将他们视

^①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724页。

^② 1896年2月《复南海康主政书》,《经元善集》,第166~167页。



作筹款募捐的对象,^①这就极大地伤害了绅商对维新事业的热情。总之,无论是郑观应还是经元善,他们的言论都表达了绅商们要在政治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1896年后,各派维新力量虽然仍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各种活动,如《时务报》的发行等,但绅商们的涉入程度已经远不如1895年间了,最后竟发展到1898年对康、梁的活动及失败作壁上观的局面。至于郑观应的情况,则有其独特性的一面。1896年春后,郑观应赴汉阳铁厂任职,不但观点的分歧,而且环境条件等都使他疏离了与维新活动,尤其是与康、梁一派的关系。

二、《盛世危言》(十四)问世

1896年对于郑观应而言,意义最大之事情是《盛世危言》的一个增订新编版本问世,这个新编版本相对于原《盛世危言》(五)的题材范围及篇幅上都有很大扩充,仅新列入正文部分的文章就有四十七篇之多,另外在各篇后记部分也有相当可观的新写文字,全书以新的编排分作十四卷,习惯称为《盛世危言》十四卷本。

说明《盛世危言》(十四)问世时间最有力的资料是下述收在《盛世危言后编》中的《与陈次亮部郎书》,其中谓:

① 郑观应在《致京都文学士道希陈部郎次亮书》中称:“孙尚书寄来书局劝捐册,弟已分送各友,所收之数除付仪器价外,已尽数交百川通票号汇上,想孙尚书已照收矣。”另外,《上孙燮臣师相寄呈日本文部省教育时务书》也谈及捐款事(《郑观应集》(下),第369、181页),由此可窥上海绅商为强学会捐款之一斑。



《盛世危言》现将续集附入,分八本,^①已铸铅板,板费六百元,纸工在外,较刊板稍廉,约中秋节后可成,容当多寄以副雅望。^②

与此则资料相呼应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1896年9月18日),郑观应从汉阳给盛宣怀的一则电报,内容有:

弟托陈次亮送公增订《危言》十部,俾转赠人。^③

当时盛宣怀由王文韶、张之洞保荐督办芦汉铁路而应诏入京。至于此份《与陈次亮部郎书》应该是1896年8月所作,该月中旬郑观应曾匆匆由汉阳返沪,其原因似乎是《盛世危言》(十四)开印在即,他要回沪安排印书及投寄事宜。^④至于《盛世危言》(十四)送稿付梓的时间当是在该年5月,当时郑观应受接办汉阳铁厂的盛宣怀急召,他从广东赴汉阳途经上海时曾有数日逗留。

这里如此分析《盛世危言》(十四)的送稿付梓和正式刊行

① 《盛世危言》(十四)最早的版本分八册,题名《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见《郑观应传》,第271页。

② 《郑观应集》(下),第368页。

③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通州《盛宣怀致郑官应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一),第219页。

④ 郑观应该年5至6月多次表示要从汉阳回沪,应是与《盛世危言》(十四)的出版有关,他终于8月19日办暂离汉阳手续,9月4日离沪再返汉阳。见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汉阳《郑官应回沪前交办事项》及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镇江《郑官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一),第180、182页。



时间,意在说明郑观应增订《盛世危言》(十四)的时间。郑观应在强学会遭封禁后不久,即1896年1~2月间返回澳门,直到5月间赴汉阳,其间有三个月的时间在粤,《盛世危言》(十四)中新增写文字的相当部分应是在此时间内完成的。如《盛世危言》(十四)中《游历》篇新写的后记中有“去腊曾致书军机处行走陈次亮部郎云”^①一说,其所云内容正与收在《盛世危言后编》另一件题为《与陈次亮部郎书》信函相一致;而该函中所谓“沪上强学会……昨江督闻京师书局被封,即嘱停办”^②之事,表明该函作于1896年1月底,^③因此《游历》篇新增写后记则应是写于1896年。

郑观应增订《盛世危言》(十四)时间的确定,对于理解《盛世危言》(十四)体现作者思想演变之线索有重大意义。《盛世危言》(十四)首先引起注意的是该书编辑上相对《盛世危言》(五)的变化,它在书前原有的诸篇序文后新增《〈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一文,书末则除了新增《〈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外,还以《〈易言〉原跋》为题附录了王韬为《易言》(36)所作的跋文。^④王韬跋文的重载使郑观应安排在书前的凡例中的一段文字有了特殊的意义。此段文字为:

① 《郑观应集》(上),第386页。

② 《郑观应集》(下),第359页。

③ 关于强学会被封禁的时间,光绪二十一年《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中谓:“附呈十二月十一日京都来电:杨崇伊参强学会,奉旨封禁,无法挽救。”

④ 《盛世危言》(十四)各卷题材编排次序也体现了郑观应思想变化动向。《盛世危言》(十四)目录见本书末附录。



或问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余曰：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①

《盛世危言》(十四)中以这样首尾呼应的安排，强化该书的道器之辨色彩。如果说1890年代初《盛世危言》(五)安排《道器》篇，是为变法论走向合法化构筑理论依据，那么甲午战后，在变法论已开始展现出合法化倾向之际，他还要如此渲染道器之辨，其思想动机就值得深究了。

甲午战后，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在社会上急剧增大，而《新学伪经考》中“认为所谓孔子之道在于孔子不是祖述者，而是创教者，其真意在于改制”^②的立场，是郑观应所不赞同的，因为郑观应认为“道”乃“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③。康有为在为变法论构筑理论依据时，走了一条与郑观应完全不同的路径，他动摇了“道”是亘古不变真理的神圣性。显然康有为在背离传统上走得比郑观应更远，他的“孔子改制”观无疑对郑观应的“道器”说造成了威胁。^④

就变法论的主要议题——议院制——的观点而言，《盛世

①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郑观应集》(上)，第240页。

② 《晚清政治思想研究》，第114页。

③ 《道器》，《郑观应集》(上)，第242页。

④ 小野川秀美先生认为：康有为之说背离了流行一时的“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洋之致强，暗合经义之精，别无实行新创之治”；并称康有为的学说“带给变法论更积极的性格”。《晚清政治思想研究》，第74、75页。



危言》(十四)相比《盛世危言》(五)也有了微妙的变化。甲午战前,郑观应是主张尽快实行议院制的,因而《盛世危言》(五)《议院》篇的后记有如下一段: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英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①

这段文字在战后被扩写为《盛世危言》(十四)《议院下》篇,而作者的观点已有了变化,所谓:

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华。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才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何则?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无人不学。且中外利弊登诸日报,妇孺皆知。^②

战后国内外形势有多方面的因素都在促使变法论者在实行议院问题上持更谨慎务实的态度,这一点是清楚的。不过突出郑观应的这种变化与康有为此时急行议院的言论对比仍是不无意义。1895年7月,康有为在京《上清帝第四书》中正式提

① 《郑观应集》(上),第314~315页。

② 《郑观应集》(上),第316页。



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张,尽管郑观应提出缓行议院说有这个背景,但不能否认他提出此说的积极意义,因为他是从国内基本社会条件不成熟的角度提出此说。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十四)《公举》篇中更具体地述及他的观点:

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①

在对康有为观点的看法上,上海绅商社会与郑观应基本一致,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实行任何急进的维新措施。经元善在戊戌年后关于康、梁维新学说的评论也代表了他此际的看法,他所谓:

康梁如药中生军麝脐,功效在开通闭塞关窍,原非参苓平和之品,全在良相医用之得当耳。吾华民气未醇,偏重效法东邻,日后恐滋流弊,谓其越中和位育笃恭而天下平宗旨,以此责备,众皆诚服。^②

由此来看,郑观应《盛世危言》(十四)中强调“道器”说以及主要观点的变化都有与康、梁维新观点相关的针对性,代表着上海绅商社会对康、梁学说不相协同的倾向。

① 《郑观应集》(上),第329页。

② 《答原口闻一君问》,《经元善集》,第349页。

